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的高丽服饰文化初探

廖邵磊¹⁾, 谢呵²⁾

1)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2) 合肥大学, 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高丽王朝服饰文化的重要文献, 其撰述源于北宋使者徐兢奉使高丽的亲身见闻, 为后世了解高丽中期服饰制度与风貌提供了翔实记录。书中系统描绘了高丽时期的王服、百官服饰、民庶服饰、王公贵族女子服饰等多种类型, 呈现出鲜明特点: 色彩上崇尚黑、白、青碧; 形制上推崇冠冕之制; 穿着规范上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 整体风格上则兼具尚俭与奢华的双重特质。这种服饰文化的形成, 既得益于高丽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 也受制于多山地少平原、自然资源匮乏所导致的经济水平, 同时深植于儒学礼制与阴阳五行思想的浸润。通过对《高丽图经》中服饰材料的梳理与研究, 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高丽服饰与汉服之间的渊源与互动关系, 也能从服饰制度这一具体层面, 深入认识高丽王朝的政治结构、社会风貌及其与宋朝的交往实况, 进而为探讨东亚古代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重要参照

关键词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高丽服饰文化; 身份等级; 文化交融

Received: January 27, 2026

Revised: February 15, 2026

Accepted: March 3, 2026

Published: March 7,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Xuanhe Fengshi Gaoli Tujing"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Xuanhe Mission to Goryeo)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studying the clothing culture of the Goryeo Dynasty. It was written based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Xu Jing, an envoy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his mission to Goryeo, providing detailed records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lothing system and styles of the mid-Goryeo period.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depicts various types of clothing from the Goryeo period, including royal clothing, official costumes, common people's clothing, and the clothing of noble women, present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dvocating black, white, and azure in color; promoting the system of crowns and robes in form; reflecting strict hierarchical

order in wearing norms; and showing the dual traits of frugality and luxury in the overall style. The formation of this clothing culture benefited from the relatively stabl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Goryeo period, was constrain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aused by the dominance of mountains over plains and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etiquette and the ideology of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By sorting out and studying the clothing materials in "Gaoli Tujing", we can not only more clearly grasp the origin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ryeo clothing and Hanfu, but als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social style of the Goryeo Dynasty and its actual exchanges with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specific perspective of the clothing system, thereby providing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ancient East Asian clothing cultures.

Keywords "Xuanhe Fengshi Gaoli Tujing"; Goryeo clothing culture; status hierarchy; cultural integration

1. 引言

服饰并不是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一种产物。服饰是人类文明标志之一，展现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高丽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历时近五个世纪。它不仅继承了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而且引进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高丽文化。徐兢作为宋朝礼物官随使高丽归来后，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下称《高丽图经》）一书。前人对《高丽图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宋、丽文化沟通、艺术交流、陶瓷茶器、宗教信仰、海路传播、建筑等方面，而较少集中关注书中高丽服饰的研究。与此同时，大多数学者对高丽服饰的探究大多展现整个高丽王朝的服饰文化，或者夹杂在其他服饰文化之中进行对比，很少有人专门研究高丽某一时期的服饰文化或者集中研究某一本书中的高丽服饰。本研究以《高丽图经》为基点，专门探究其中记载的高丽服饰文化，包括其服饰类型、服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这能够让我们较好了解北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对于深刻认知朝鲜半岛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其中所记载的服饰文化的研究，则是从日常最基本需求的“衣”这个层面切入古代朝鲜半岛人的礼仪制度及文化心理，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古代朝鲜半岛的服饰特点及其文化风貌。

2.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高丽服饰的主要类型

徐兢在高丽的几个月，考查了高丽的山水、地輿、习俗、制度、典章、服饰等，回国之后就编撰成《高丽图经》一书。其中与服饰相关的有：冠服、仗卫、道教、民庶、妇人、皂隶等卷。其中所记载服饰文化巨丰，根据其所记载的内容，笔者依据服饰的功用和穿着者的身份等，将其分类如下：王服、百官服饰、民庶服饰、王公贵族女子服饰、其他服饰。

2.1. 王服

王服，高丽王所穿的服饰，主要包括常服、公服和祭服等。

常服主要是高丽王日常生活中穿着的服装。“燕居之时，则皂巾白纁袍，与民庶无别也。”^{[3]25}高丽王朝时期，白纁是织就夏布的主要材料。在居室中时，高丽王头戴黑色头巾，身穿白苧麻所制的衣袍，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可见当时白纁袍为高丽王朝比较常见的一种服饰。

根据高丽王会见对象身份不同，高丽王公服可以分为一般公服与特殊公服。一般公服是高丽王平时上朝所穿的衣服。徐兢记载高丽王平素朝见臣子时，则头戴乌纱高帽，身着浅黄色的窄袖袍，前额戴紫罗额带，“其会国官士民，则加幞头束带”^{[3]25}其服饰由中国唐代服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1]卷153}发展而来。在中国大多数时期，黄色服装象征着皇权，只有皇帝能穿。由于高丽王对北宋来说是臣子，所以穿淡黄色公服。高丽王常服袍袖相对较窄，腰间束紫色腰带并绣以纹案。

特殊公服是高丽王会见北宋使节穿的衣服。“紫罗公服，象笏玉带，拜舞拊蹈，极谨臣节。”^{[3]25}由此可知，高丽王的特殊公服主要借鉴北宋公服制度，即紫公服、象笏、玉带等。北宋服饰在元丰年间进行改制，“改为去青不用，紫色四品以上服用，绯色六品以上服用，绿色九品以上服用。”^[4]

卷153

祭服则是高丽王祭祀时所穿的礼服，“祭则冕圭。”^{[3]25}冕是皇、诸侯在举行重大活动时戴的一种前面低后面高的帽子。帽子前面的五彩丝绳称为旒，每旒的长度为十二寸。根据戴冕之人的身份品级不同，旒的数量也会有所变化，周天子的冕上有十二旒，诸侯冕上的旒则按其等级不同依次递减。到了唐朝，对旒进行改制，使用二十四旒。

圭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古代那些用玉石制成的礼器，形似一块板子，上面是尖的，下面是放方的。圭的名称、大小因爵位及用处不同而有所区别。《说文解字》：“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穀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2]289}徐兢对高丽王的祭服

并没有进行详实的记录，但从高丽王服饰的形制中可以看出，高丽王祭服也是模仿中国礼制。

2.2. 百官服饰

百官服饰主要为高丽王朝官员上朝时所穿的服饰，依据官员品级不同，服饰亦不同。据《高丽图经》中所载，官员等级自上至下为令官、国相、近侍、从官、卿监、朝官、庶官、吏职等。笔者依百官名称归类为吏官服、近侍服、卿监服。

2.2.1. 吏官服

主要包括令官服、国相服、从官服、朝官服、庶官服、吏职服。

令官服，“纱制幞头，紫文罗袍，玉带佩金鱼”^{[3]26}高丽令官头戴纱罗软巾，着紫色罗袍，腰间系以玉带，并佩以金鱼，据此便可充分体现其非凡的身份。幞头，亦称折上巾，是一种用来包头的软巾。幞头总共有四根带子，前面二根带子用来加固额头和保持发型，最后二根带子设在头发的后面，仍然起着稳定的效果。由于幞头通常都是用青黑色的纱罗做成，所以又称为“乌纱”或者“乌纱帽”。

国相服，“紫文罗袍，毳文金带，佩金鱼”^{[3]26}高丽国相则着紫色罗袍，腰间系毛毳纹路的金带，并佩带金鱼袋。

从官服，“紫文罗袍，御仙金带”^{[3]26}高丽从官着紫色罗袍，腰间系绣有御仙花的金带，高丽王的兄弟及王世子也可以穿此类服饰。

朝官服，“绯文罗袍，黑鞞角带，佩银鱼”^{[3]27}高丽朝官服制以此为准。其他官阶的官员则有年限，只有等到升迁后才改换服饰。当宋朝使至，有朱衣吏二人引马，不佩鱼袋，效仿的是宋朝的朱衣双引。

庶官服，“绿衣木笏，幞头乌鞞”^{[3]27}高丽庶官则穿绿色官袍，头戴折上巾，腰间系乌色皮带。

吏职服，“与庶官服色不异，但绿色时有深浅”^{[3]71}高丽王朝时期，吏职官服与庶官服颜色并无二致，但绿色有深有浅。旧时相传，高丽吏职官服应用绿色大抵是模仿唐朝服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高丽民风淳朴，节俭之风盛行，且一件衣袍价格几近一斤白金的花费，所以吏职官袍都是重复利用，经过多次浣洗染色，吏职官袍颜色与碧色十分相近。吏职中有时还会由贵家子弟在其中就职，所以吏职官服都经漂洗再染后还需传承给后代继续使用。由此可得知，高丽王朝经济羸弱，就连吏职官服都要多次继承使用。

2.2.2. 近侍服

“紫文罗袍，御金仙带，佩金鱼”^{[3]26}高丽王朝近侍着紫色罗袍，腰间系绣有御仙花的金带，再佩以金鱼，以此来彰显其地位尊崇。

2.2.3. 卿监服

“绯文罗袍，红鞞犀带，佩银鱼”^{[3]26-27}高丽卿监着绯色罗袍，腰间系红色皮腰带，再佩以银鱼。高丽仍依循宋朝制度，只要是穿紫色或者绯色衣服的官员，都要相应配带金鱼与银鱼，这也是突显官员职位的高低的方式之一。

2.3. 民庶服饰

《高丽图经》中记载的民庶服饰类型较多，包括文生服、庶民女服、农商服、工技服、民长服、舟人服、僧服与道士服。笔者按其职业不同将其归类为文生服、民商服与僧道服。

2.3.1. 文生服

即进士服，“四带文罗巾，皂袖为裘，黑带革履”^{[3]67}预贡时戴帽子，登科时佩青盖，读书人均以此为荣光。在高丽王朝时代，对进士登第的称谓会因地方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分成三级，土贡是王城范围以内的进士称谓，乡贡是县邑以内的进士称谓，而宾贡则是他国推选出来的进士称谓。

2.3.2. 民商服

包括农商服、庶民女服、工技服、民长服与舟人服。

农商服，指普通民众与商人的服饰。无论贫富贵贱，都穿“白纁袍，乌巾四带”^{[3]67}此时，主要以布的精细为判断标准来辨别平民与商人。达官显贵燕居之时，除头巾两带以外，其他与农商穿着无异。

庶民女服，包括妇女、贱使及婢妾等服饰。

高丽时期的女子服饰多以白纁黄裳为主，不禁颜色，只禁花文，并派御史稽查其服饰，若饰以文罗，则断罪处罚，于是民庶无敢不从。《高丽图经》记载：“民庶之家，女子未嫁，红罗束发。”^{[3]70}贱使则“细民之家特无蒙首之物，服旋裙”^{[3]70}蒙首，又称盖头，最早的盖头大约出现在齐朝时期，当时妇女用它来保护自己免受风寒，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女子遮羞的帷帽。而高丽当时一巾的价格接近一石米，贫苦百姓没有钱财，且日常需要进行大量劳动，故而高丽一般女子无蒙首。

旋裙是宋朝的裙装，“旋裙其形制是在裙的前后开跨，以便乘驴之用。因其行动方便，武士亦好穿用，配一铠甲，亦名‘战裙’。”^{[3]69} 裙身为两联式结构，裙片不打褶，裙腰高，腰两端有系带，围系穿着的裙装。可以是单裙，也可以是夹裙。

婢妾则“以其执事服勤故，蒙首不下垂，叠于其顶，摳衣而行”^{[3]69} 媵是陪送。古代时期女子出嫁，陪嫁的人叫媵，这个人一般是同族的姐妹或侄女，所以媵的地位上虽然低于嫡妻，但远高于妾。而且媵是天子，诸侯和皇室贵族，士大夫才能纳，而普通阶层只有纳小妾的资格。由于蒙首售价昂贵，所以平民女眷无蒙首之物，更没有绛囊蔽手。可见媵妾虽身份不如正室，但其服饰与平民女子服饰相较而言还是华贵不少。

工技服，则“白纁袍、皂巾，唯执役趋事，则官给紫袍”^{[3]67-68} 工技常穿的衣服则是高丽最常见的白纁袍，与百姓并无不同。只有当从事正式工作时，官府才会分发紫色罗袍。

民长服，则“文罗为巾、皂袖为裘、乌革句履”^{[3]68} 从民长所穿服饰可以看出民长的生活要比普通百姓要富足一些，毕竟高丽当时文罗一巾，近似于一石米的价格，而百姓穷苦，根本消费不起文罗。可见民长应是民中较富足者，其服饰较平民服饰也华贵些。

舟人服，即划舟之人的服饰。舟人“作竹冠以冠之，或方或圆，初无定制，短褐被体，下无袴襦”^{[3]68} 在高丽头巾中，文罗质地最佳，但一巾的花费，相当于一石米的价格，普通百姓难以负担。当时如果不戴冠露头的话，则与罪犯囚徒没有什么差别，于是舟人作竹冠加以分别。夏季天气炎热，常在水上行舟，长衣袴襦容易闷热和被打湿，所以常穿短衣，下无袴襦，这样有利于散热，而且还可以保持衣物整洁。

2.3.3. 僧道服

即僧服与道士服。佛教文化在高丽十分盛行，并被奉为高丽国教。自高丽太祖王建开始，佛教被后历任高丽国王深信。《高丽图经》中对僧道及其服饰的记载，具体可参见下表 1。

表 1 僧道服饰列表

序号	僧道名称	服饰特点
1	国师	出水袈裟、长袖偏衫、金跋遮下、紫裳
2	三重和尚大师	紫黄裳、福田袈裟、长袖偏衫
3	阿闍黎大德	短袖偏衫、坏色挂衣、黄裳
4	沙弥比丘	坏色布衣，戒律高则穿紫服，升迁则着衲衣
5	在家和尚	白纁窄衣，束腰皂帛，徒跣以行
6	道士	不以羽衣，白布为裘，皂巾四带

三重和尚大师这一等级的僧人寥寥无几。相反，阿闍黎大德的数量却十分庞大。在家和尚，既不穿戴袈裟，也不用持守戒律，偶尔会有穿鞋袜的在家和尚，这些则是已经成家，娶妻生子的在家和尚。衲衣即袈裟，苏轼在《磨衲赞》中曾谓：“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游京师，天子闻其名，以高丽所贡磨衲赐之。”^{[3]卷69}当时高丽向宋朝纳贡时，其中就包括僧衣磨衲，而纳贡一般进献的都是较好的东西，如此可见磨衲在当时高丽僧衣中地位不一般。和高丽当时的风俗相比较，道士服装的特征是上衣肥大，衣袖狭窄。高丽睿宗统治时期，宋朝道教到达了鼎盛，同时也感染着当时和宋朝交好的高丽。睿宗下诏令修建了高丽的国家道观——福源殿，弥补了高丽道教的空缺。

2.4. 王公贵族女子服饰

王妃秋冬的衣物则“间用黄绢，或深或浅。以红为尚，益加绘绣”^{[3]69}高丽王朝向宋朝纳贡时，除高丽王曾多次被赐予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王妃夫人追崇红色，也是受宋朝服制影响。

“妇人之饰，不喜涂泽，施粉无朱，皂罗蒙首。”^{[3]69}高丽贵妇们不喜欢修饰容貌，涂脂抹粉，用皂罗制蒙首来遮面。“白纁为袍，略如男子，制文绫宽裤，里以生绢，其褻裕不使著体。”^{[3]69}高丽贵妇的服饰大体同于男子，也是白纁袍，用未漂煮过的丝织品为里子，再配以采绦金铎和锦香囊，以此来显示其华贵。

仗卫，手持兵仗的侍卫。高丽时期，男子十六便服军役，除六军上卫常留在官府，其余的则给田受业，寓军于民。六军不受黥墨等残酷刑罚，没有驻守聚集的营地，只以其穿着的衣服作为区分。侍卫的铠甲上下相连，里面穿着无里子的大袖衣服，形制十分怪异。头戴金花高帽，帽高几近三尺。徐兢认为六军服制诡异与高丽人的身形矮小有关。《高丽图经》中记载的仗卫服饰具体如表 2。

表2 仗卫服饰列表

序号	侍卫名称	服饰特点
1	龙虎左右亲卫旗头	毳文锦袍、展脚幞头，涂金束带
2	龙虎左右亲卫军将	毳文锦袍、帽头两脚折而上、涂金束带，饰以金花
3	神虎左右亲卫军	毳文锦袍、金花大帽，涂金束带，加紫带系于颌下
4	兴威左右亲卫军	红文罗袍、金花大帽、黑犀束带
5	上六军左右卫将军	介冑、文锦络缝、垂十馀带，饬以五彩绣花
6	上六军卫中捡郎将	紫衣、幞头
7	龙虎中猛军	青布窄衣、白纁穷裤
8	金吾仗卫军	紫宽袖衫、幞头
9	控鹤	紫文罗袍、折上幞头、五彩间绣大团花
10	千牛左右仗卫军	绯窄衣、皮弁、黑角束带，腰有二襜，饰以兽文
11	神旗军	朱衣短后、皮蒙首，复加两襜，饰以兽文
12	龙虎上超军	青布窄衣、文罗头巾
13	龙虎下海军	青布窄衣、黄绣盘雕、红革铜带
14	官府门卫校尉	紫文罗窄衣、展脚幞头
15	六军散员旗头	紫文罗窄衣、展脚幞头、束带革履
16	左右卫牵拢军	紫窄衣练鹊文锦、乌纱软带、布襦革履
17	领军郎将骑兵	紫罗战袍、白裤皂履、文罗为巾，饰以珠贝
18	领兵上骑将军	紫罗窄衣、展脚幞头

高丽王朝的仗卫服分为头衣、身衣、带、足衣等四个部分。头衣主要包括展脚幞头、折上幞头、金花大帽、兜鍪、皮弁、蒙首等,人们可以根据头衣来区别品级高低。展脚幞头是用青灰色的纱罗做成的,在外面也是漆成黑色的,而展脚是由厚铜丝制成的骨架,用细银丝网环绕在其周围。从幞头的制造角度看,整个幞头都是在外部漆成黑色,纱的结构也是很清晰的,头部二片纱的连接并没有油漆的痕迹,但它却相当牢固,同时在交接处有杂乱的墨书文字以及记号等。兜是一个头盔,而并非一个完整的头盔,类似于口袋,带有一定的可变度。因此大多数兜鍪除防护头部之外,还能够防护整个头部、颈部、及部分面部和肩部。秦汉之前称为头冑,后为兜鍪。种类多依形状而设定,如虎头兜鍪、凤翅兜鍪,狻猊兜鍪等。皮弁是一种头衣。《诗经·淇奥》也记载了这种装饰:“充耳琇莹,会弁如星。”^{[4]149}文献说的前面高后面低的皮弁冠,与用黑色细丝所做的委貌冠外形类似。可依据头衣来分辨等级高低。

身衣大多为袍和衣，主要有毳文锦袍、红文罗袍、紫文罗袍、紫罗战袍、大花战袍、紫衣、青布窄衣、紫文罗窄衣、绯窄衣、朱衣等。带，即束带，因材质不同有涂金束带、黑犀束带、紫带等。

吏人主要包括散员、人吏、丁吏、房子、小亲侍、驱使、仙郎等，驱使与仙郎相似，大抵皆未娶之人。贵家子弟称仙郎，庶官小吏之奴称驱使。这些吏人的服饰也有所不同。这些人具体的服饰在《高丽图经》中都有记载，具体可参见表 3。

表 3 吏人服饰列表

序号	吏人名称	服饰特点
1	散员	紫罗窄衣、幞头、革履
2	人吏	皂衣、幞头、乌革句履
3	丁吏	文罗头巾，使至则加幘
4	房子	紫衣负带、文罗头巾、皂履
5	小亲侍	紫衣头巾，复被其发
6	驱使	繻袖乌巾
7	仙郎	其衣或纱或罗，皆皂也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丽王朝时期对各个阶层的服饰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也说明高丽王朝时期服饰制度是比较完善的。

3. 《高丽图经》中的服饰文化特点

3.1. 服饰颜色崇尚黑、白、青碧

据上述可知，高丽王常服则穿皂巾白纁袍；农商皆着白纁袍、乌巾四带；工技常服白纁袍、皂巾；民长也穿皂袖裘、乌革句履……无论是高丽王还是平民百姓常服都以黑、白二色为主。直到现在，韩国仍有“白衣民族”之称。高丽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季节变化明显，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因此人们的服饰也适应了季节变化。夏季天气炎热，衣的颜色多为不易吸热的浅色。《高丽图经》中记载不论是高丽王还是民商下吏，无论身份高低，都常穿白纁袍。

高丽庶官穿绿衣；吏职穿青碧官服；进士登第时给青盖；龙虎中猛军、龙虎上超军、龙虎下海军服青布窄衣……由此可知高丽官职较低的官员公服则以青碧色，而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宋朝官服公服已经改为去青不用，且高丽公服制度主要沿用宋朝服制。距徐兢出使高丽，宋朝官服改制已将近四十年，为何高丽没有去青不用而继续使用青碧色呢？笔者以为，这与当时高丽

的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高丽虽是朝鲜半岛较繁盛的时期之一，但与宋相比，还是相对落后。当时高丽衣袍的价格并不便宜，而吏职属于较低品阶的官员，人数较多，如果效仿宋朝去青不用，这对高丽财政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花费。加上高丽当地民风纯朴，所以青色官服被保留了下来。综合上述可知三韩之地，服饰颜色以黑、白、青碧为主。

3.2. 推崇冠冕

“太加主簿著帻如冠，小加著折风如弁，岂依仿商周冠弁之制而然乎。”^{[3]25} 帻，又称巾帻。帻常在冠下，或者单用。

高丽王朝时，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小民，都以冠冕为尚。高丽王祭祀时戴冕，平时上朝则戴乌纱帽。百官上朝时也戴乌纱帽，进士则戴四带文罗巾。从上述高丽舟人为与罪犯囚徒等区分开来，选择伐竹制冠的事实中可见，高丽时期冠冕是区分身份等级的重要依据之一。露头在当时是一种耻辱，只有罪人与囚犯不允许戴帽子，所以就算是普通百姓没钱买文罗所制的帽子，也要伐竹编帽。从上述仗卫服饰的记载中，可以得知的是高丽王朝不仅以帽子区分品阶，而且十分注重帽子的美观。仗卫的冠冕有展脚幞头、金花大帽等形式，并且会在帽子上运用鲜艳的色彩、簪以金饰、绣以团花。

3.3. 服饰等级制度森严

宋太祖建立北宋之后，制定的各项制度，大多继承沿袭了唐朝以及五代十国的各种制度，其中自然包括官服制度。由上述可知，元丰改制之后，官服已经不再使用青色。此时的高丽王朝模仿宋制，“逮我中朝，岁通信使，屡赐裘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翁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3]25} 其服饰形制也有着区分等级秩序的重要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官服。官员有不同的等级，相应的他们的官服也有所不同。在颜色方面，高丽官服制度分为四种即紫色、绯色、绿色和青色。徐兢作为礼物官出使高丽时是宣和年间，即 1119 年-1125 年，此时宋朝官服已经改制，青色官服基本废弃，而此时高丽官服中还存在着青色官服，这也是当时高丽服制与宋服之间的差异之一。

高丽服饰不仅以色彩来区分贵贱，其配饰也有明确等级作用。配饰主要有腰带和鱼袋等。高丽令官穿紫色罗袍，系玉带，佩金鱼；国相则穿紫色罗袍，系毳文金带，佩金鱼；从官穿紫文罗袍，御金仙带，佩金鱼；卿监则穿绯文罗袍，系红鞞犀带，佩银鱼。

在图案颜色方面，高丽王朝的服色也充分体现了尊卑劣等的差异，等级制度严格，其对颜色的应用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由上述可知，神旗军穿后幅较短的朱红色上衣，再加两件遮至膝前的短衣，并用兽文加以修饰。龙虎上超军等的衣服都附有龙纹，并用彩线缠绕编织成花形，用撚紧的金线绣衣，而绉缩其线纹，制作十分精巧。龙虎下海军着青布窄衣，上面用黄色的丝线绣出盘旋飞翔的猛雕。

3.4. 尚俭与奢华并存

高丽王朝时期，上至高丽王下至普通百姓，各个阶层的日常服饰中都以白色苧麻所织的夏布为主。苧麻自古便被作为重要的纺织纤维作物之一，广泛应用于服饰之中。苧麻面料的特点就是纤维长，整体外观非常明亮，透气性也比较强，适合用做夏衣材料。而且苧麻耐磨，不易被腐蚀，可以多次洗涤后再穿。《高丽图经》中工技条中记载，工技常穿白纛袍，只有执行公务时官府才分发紫袍，这样大大减少了工技紫袍的磨损与消耗，同时也为高丽王朝节省了一大笔服饰方面的开支。高丽王朝时期，一袍价格几近白金一斤，十分昂贵，于是吏职服都是一洗再洗，代代相传，导致吏职服的颜色深浅不一。由此可知高丽时期全国上下崇尚节俭，盛行朴素的穿衣之风。

高丽王朝时期服饰方面虽然崇尚节俭，但其冠冕却是一个例外。《高丽图经》中记载“太加主簿著帻如冠，小加著折风如弁”^{[3]25}宋朝未赐衣于高丽时，高丽就用帽式严格区分阶级，“高丽妇人衣白，而男子衣纛锦。贵者冠帻，贱者冠折风。”^{[5]5}唐初，高丽以白罗制冠，当时白罗价格昂贵，用来制冠体现其对冠冕的重视与奢华。宋朝多次赐服于高丽后，高丽渐遵宋之制度，华风丕变，但其冠冕仍旧十分华贵。高丽王祭祀时则戴冕，将士中的领队伍所戴用金花高帽将近三尺；龙虎左右亲卫军将的帽子帽头两脚微曲折向上，并用金花装饰；神虎左右亲卫军戴用金花大帽，并加装紫带系在颌下；兴威左右亲卫军也戴金花大帽；自龙虎神威以下，都戴紫色帽子。高丽王朝时期，普通百姓只能伐竹编帽，而身份高贵的统治阶级不仅有文罗所制的帽子，并且加以金饰。在当时经济薄弱的条件下，文罗一巾，准米一石，用来制帽已经十分奢侈，更何况再用金花加以装饰，可见高丽贵族阶级在冠冕方面极尽奢华。

4. 《高丽图经》中服饰文化的成因

4.1. 政治因素

在唐朝力量的支持下，高丽取缔其他政权，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历经四百多年，政治结构总体稳定，所以其服饰等级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且

历任高丽王曾多次被赐服：“靖宗九年十一月契丹主赐冠服。文宗三年正月契丹主赐冠服……三十二年六月，宋神宗赐衣二对。宣宗二年十一月辽主赐冠冕衣带圭。肃宗二年十二月辽主赐冠冕章服圭。九年四月辽主赐衣对。睿宗三年二月辽主赐冠冕衣带。仁宗二十年五月金主赐九旒冠一项九章服一副玉圭一面。”^{[6]志卷26} 不仅历任高丽王被赐衣，王妃群臣皆有赐。由此可知高丽服饰受多种外来服饰文化的交织影响，《异域志》中称高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7]3}。

睿宗时期是宋、丽关系最密切的阶段。自乾统八年到戊戌年十年间，高丽与北宋的外交往来渐入蜜月期。为示友好，宋朝赐予各种祭器、药物、字画和珍奇古玩给高丽。为了解决高丽医疗水平低下的问题，宋朝还派了数名医者前往高丽进行援助。总而言之，这段时期高丽与宋朝双方的交流达到了最高潮。其中宋朝服饰制度对高丽服饰的影响尤为显著。宋朝建立后，高丽引进了宋朝的男子服饰与女子服饰，且毅宗朝时规定，“四品以上服紫色，六品以上服绯色，九品以上服绿色”^{[11]志卷26} 与宋神宗元丰改制时的服制完全相同。宋代冠冕根据官员品级高低不同，在具体型式与装饰也有所不同。“宋代冠冕的名目和形制甚多，常见的通天冠、风冠、平天冠、头巾、京纱帽、幞头、卷脚帽、裹绿小帽等。”^{[8]80} 平民男子使用最多的是幞头，上至皇帝，下至士庶百姓都可以使用。此时高丽王朝，高丽王与百官上朝时则戴乌纱帽，普通百姓则戴幞头，与宋冠冕制度并无二致，所以徐兢称其衣冠“一遵我宋之制度”。

4.2. 经济因素

高丽是一个农业国家，经济主要依托土地财政，但其境内多山地少平原，肥田罕见。此外，高丽商品经济十分落后，长期处于物物交换阶段。徐兢描述当时的经济状况为：不论男女老幼、官吏工技，都进行物物交换，没有货币交易的方法，只规定了纁布银饼的价值。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东西，两者不相当时，则用米来补偿。直到高丽肃宗时期开始使用金属货币，可见当时高丽经济整体羸弱。高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了高丽服饰不够华丽，民众阶层大多着白纁袍，乌巾四带。衣物一洗再洗，代代相传。高丽上层贵族服饰也比不上当时宋朝贵族服饰华丽。徐兢记载当时高丽的吏职服，因为衣袍价格不菲，所以需要重复使用，经过多次浆洗上色后，服饰颜色深如碧色。而且吏职的选用不区分等级，有的时候贵族子弟也会担任吏职，吏职服便被传承世袭给了后代使用。由此也印证了高丽经济并不发达，从上文对舟人的述说中也可得出高丽经济孱弱的事实。

4.3. 文化因素

牟元珪在《韩国“尚白”习俗的由来》中认为韩国尚白的原因有二：“一是喜欢清洁，二是源于太阳神崇拜。”^{[9]85}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高丽服饰文化中的颜色倾向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礼记·礼运》中记载“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谓三统。”^{[10]卷3}这并不是仅表示服装的颜色，甚至表示车辆、马匹、旗帜、祭祀礼器等的颜色，也存在着相应的颜色习俗。“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的习俗对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影响，而中国古代与高丽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高丽图经》：“高丽……自箕子封时，已教以田蚕之利，当有衣冠。”^{[3]25}箕子，商朝末期人。周武王伐商之后，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了政权，史称箕子王朝。箕子带去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通晓各种本领的能工巧匠，他们都精通诗书、礼仪、医药、阴阳、巫术等。《异域志》中也谓：“其医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12]3}从某个角度来看，箕子不但带去了相关诗书、医药等文化和技术，还带去了殷商尚白的文化传统。

阴阳五行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源于西周，成于战国，兴于西汉。古代朝鲜与中国相通，各个方面都有受到五行学说的影响。在服饰色彩方面，古人把赤、黄、青、白、黑五种颜色称为五正色（也称五彩），绿、碧、紫、红、硫黄称为五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涵义。从高丽王着淡黄色公服，令官、国相、近侍、从官穿紫色官服，朝官与卿监着绯色官袍，到庶官穿绿袍就可以看出古代朝鲜服饰大量运用了五行色彩，并遵循其所蕴含的上下尊卑等意蕴。仔细研究僧道服、仗卫服等都能看出这一现象。上六军左右卫将军饬以五彩绣花、控鹤饰以五彩间绣大团花，可见用五彩绣花是当使比较通行的一种修饰方式。从上述高丽王朝时期的服饰文化倾向中，可以明显感知到古代朝鲜服饰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处容舞中^[3]，五个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处容，以身着黄衣的处容为中心，共同翩翩起舞。这五个处容的服色，正是阴阳五行中的五种颜色。”^{[11]51}金义淑认为这种处容舞是中国阴阳五行的色彩文化在高丽舞蹈中的具体反映。“神石”与“神木”上悬挂的五彩布条、祭祀用的五彩旗、婴儿周岁的彩虹袄与妇女的五彩衣等也体现了阴阳五行文化对高丽的陶染。

古代朝鲜深受中国传统伦理与道德的影响。中国服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儒家的“礼”已经成为核心概念。在儒家思想的影响，高丽开始重视编年史的修订，在当时高丽仁宗的支持之下，当时编纂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国史记》。儒学不仅渗透在高丽的政治、思想、文化中，也影响着高丽的服饰文化。在儒学中，冠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首先成为“礼”的象

征物之一。《释名·释首饰》说“冠者，贯也，所以贯韬发也。”^{[12]158}在古代，冕、冠、弁、巾等各种“帽子”可并非人人都能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冠服制度，同样也影响着作为中国的属国古代朝鲜。高丽王朝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薄弱的情形之下，其上层贵族却仍然享有较高质量的服饰，此时服饰体现的主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服饰等级制度十分鲜明，徐兢谓高丽冠服“一遵我宋之制度”。可见中国文化尤其是五行文化、儒家文化等促成其独特的服饰颜色和森严的等级。

5. 结论与思考

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服饰史料，可以清晰地窥见 12 世纪高丽王朝服饰文化的多重面貌。徐兢以宋朝使臣的观察者视角，为我们记录下一个深受中华礼制浸润却又保持本土特色的服饰体系：从王服至民庶，服饰形制呈现出严密的等级秩序；色彩崇尚方面，白、黑、青碧构成主调，折射出阴阳五行思想的深刻影响；冠冕制度备受推崇，体现着礼制观念的深入人心；整体风尚则在“尚俭”与“奢华”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王室仪典之服华美庄重，而平民日常之服则相对质朴。本文围绕以下核心学术问题展开探讨：其一，《高丽图经》所载服饰类型与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等级结构与文化特征？其二，高丽服饰文化为何会形成尚白、尚青碧、崇冠冕、严等级等特征？其三，透过服饰这一物质文化载体，可以如何理解高丽与北宋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以及中华服饰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变异机制？其四，以《高丽图经》为单一文献基础的断代式、专题式研究，相较以往通史性或比较性研究，能够为理解高丽服饰提供哪些新的方法与视角？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考察，本文认为：高丽服饰文化是在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双重作用下逐步形成的。一方面，高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多山地少平原的地理条件，制约了服饰原料的获取与工艺的精进，使得“尚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选择；另一方面，儒学礼制与阴阳五行思想的深度植入，使得服饰被赋予了区分尊卑、昭明秩序的符号意义——无论是王服的冕旒章数、百官的公服颜色，还是庶民的首服形制，均可从中窥见中华礼制的投影。与此同时，高丽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在吸收过程中进行本土化改造，如某些服饰细节的简化处理、色彩偏好的地域性选择等，皆体现出文化接受过程中的选择与调适。

由此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高丽时期，服饰已不再局限于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而是成为承载审美观念、标识身份等级、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文化符号。服饰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既受制于经济基础与自然条件，又受惠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再造。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同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

高丽逐渐凝练出兼具中华礼制底色与朝鲜半岛特色的服饰文化体系，成为其能够在东亚诸国中彰显文化自信、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重要表征之一。

展望未来，尚有若干议题值得进一步拓展，其一，可结合高丽不同时期的文献与考古实物，对高丽服饰的历时性演变作更加细致的分期研究，以揭示其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其二，可将《高丽图经》所载服饰与同期宋、辽、金等周边政权的服饰制度作更系统的比较，以深化对东亚服饰交流格局的整体认知；其三，可尝试引入物质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的视角，探讨服饰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生产、流通、使用与意义再生产过程，从而更全面地还原服饰与古代朝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唯有如此，才能从“衣”这一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更深刻地理解古代东亚世界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参考文献

- [1]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 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 [4]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 [5] 罗山.职贡图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 [6] 郑麟趾.高丽史[M].成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7] 周致中.异域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8] 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9] 牟元珪.韩国“尚白”习俗的由来[J].当代韩国，1998(4).
 - [10] 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1] 金义淑.朝鲜文化与阴阳五行说[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 [12] 王国珍.《释名》语源疏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